

清文化丛书



大清

郑川水 陈磊 编著

陪都盛京

DA QING PEI DU SHENG JING



沈阳出版社

清文化丛书

大清陪都盛京

郑川冰 陈磊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陪都盛京 / 郑川水编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7

(清文化丛书)

ISBN 7-5441-2632-3

I. 大... II. 郑... III. 沈阳市—地方史—史料—清代
IV. K29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569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5

字 数: 50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树权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霍明相

责任校对: 霍明相

责任审读: 刘大鹰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24124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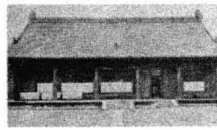
E-mail: sysfax - cn@sina.com



《清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刘迎初				
主 任	王世伟	王 玲			
副 主 任	周永诗	封兆才			
执行主编	周德礼	李树权			
副 主 编	金 鸥	霍明相			
编 委	张 杰	曲彦斌	张佳生	张志强	
	郑川水	耿 璞	何晓芳	佟 悦	
	姜相顺	王佩环	刘振操		
总 责 编	李树权				

目 录



1 小 引

3 明清鼎革风雷激
九王决策立留都

8 创业重地固根本
陪都建置渐完备

14 宫阙缭墙新拓展
盛京市容展新貌

21 陪都军府镇东陲
睦邻守边史册留

27 司驿管理立规制
驿站交通新发展

俗尚骑射精武艺 34
八旗骁勇守边徼

旗民融洽谋发展 41
产业开发兴盛京

陵工营缮渐启动 50
斑斓恢弘盛京陵

特色经济臻开发 58
盛京贸易趋繁荣

右文图治办学校 66
陪都文化蔚然兴



目 录



小 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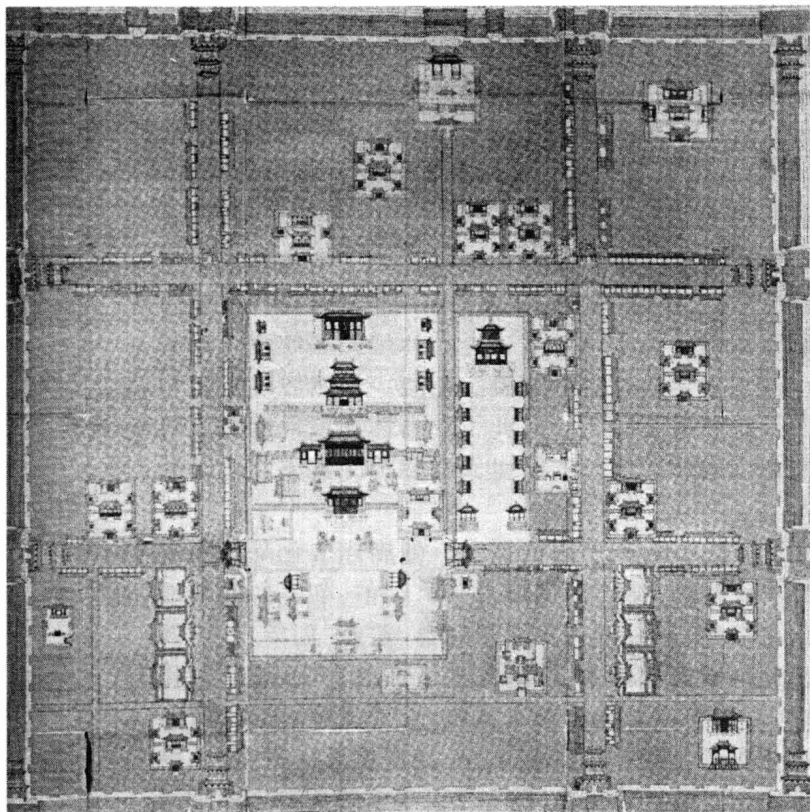
陪都盛京，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第二首都，也是遗存与珍藏大量清朝名胜古迹与大量清代工艺美术精品的文化之城。今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绢质《盛京城阙图》，真实地反映了清初盛京城市、皇宫的分布格局与建筑规模。图中宫殿、王府名称用满文书写，城门、寺庙、坊楼则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对了解当年陪都盛京的城市结构、建筑风貌具有重大作用。至今仍被完整保存着的盛京皇宫，宏伟壮丽，金碧辉煌；那屹立于沈阳市郊、被参天古松拥抱的福陵、昭陵，依然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建筑成就与魅力。凡此，都具体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被世人誉称为“盛京文化”的代表作。

盛京文化肇始于“白山黑水”的满族文化基础上，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博采蒙古、藏、锡伯、朝鲜各族和地域文化之精华，经过清代长期的融会、整合、创新、升华而成为东北区域文化体系。在清王朝迁都北京后，盛京文化输入京师，为盛京文化与燕京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长江文化等的接触开创了新局面。漫步盛京皇宫，那条昂首舞爪的金龙最引人注目，堪称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



精品。人们不难从这一艺术杰作中领略盛京文化中的神龙拼搏精神和深邃的文化内涵，难怪国际学术界盛赞它是东北建筑史上满汉建筑艺术相互融合的结晶。自此，盛京文化以沈阳为基地，利用清朝陪都的有利条件发展壮大，并不断向外传播，为振兴祖国北疆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盛京城阙图





明清鼎革风雷激 九王决策立留都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以九王多尔衮为统帅的清军胜利攻克北京。当时,明朝崇祯帝早已吊死煤山,李自成农民军也已撤离北京,中原大地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在谋臣范文程等人襄赞下,多尔衮在进入北京之初就立即下令严肃军纪,以利安定局势,规定“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并禁士兵随意进入百姓之家,“军兵出入人家者,论以斩律”。与此同时,为争取明朝上层,还在明宫武英殿朝房和已经归顺的故明官吏李明睿等人商议如何办理“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輿情”事宜。经议定朱由检庙号“怀宗”,溢号为端,称“怀宗端皇帝”,安神主于帝王庙,由归顺后被任命为“五城御史”的故明官吏曹溶等五人主持丧礼,“监肃诸议”。一些归降的官员如朱徽、熊文举、杨枝起等纷纷前来“哭临志哀”。多尔衮此举虽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不时仍有“流言四起”、“民心惊惶”的事件发生,甚至传言“旗兵”还要“放抢三天”,要“杀光壮年人和老年人,只留小孩”等等。如何把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继续巩固,实现太祖太宗“定鼎中原”的宏图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此关键时刻，身居摄政王的多尔衮沉着地坚持迁都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位自天聪二年(1628年)即被先帝封授为“固山贝勒”(即旗主贝勒，也称和硕贝勒，俗称“九王”)以来，经过多年征战已经成为颇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多尔衮认为，急速迁都北京，以盛京为留都，这不仅是安定局势的需要，而且也是继续推进先帝“底定中原”、统一全国战略的要求。为此，多尔衮与谋臣筹议，

仿照明朝“两京之制”，做出了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为留都的决策，并就都城机构搬迁及留都的驻守做了规划与安排。

尽管多尔衮的迁都决策获得随军贝勒、部将与大臣的赞同，但却也遭到部分新兴军功贵族反对。这些依靠战争俘掠起家的新贵，迷恋于盛京城内的王府和财富，满足于“止欲帝关东”的既得利益。当时的亲王阿济格就大发“奇谈怪论”，反对迁

多尔衮画像





都。他甚至扬言：“以前初得辽东，因不随意杀人，故旗人被杀甚多。如今取得北京，应趁兵威屠戮，然后留诸王镇守，大军或退归盛京，或退保山海关，方可断绝后患。”阿济格是多尔袞的兄长，被封为英亲王。他的这种反迁都、屠京师、“纵兵饱掠而归”的谬论，其政治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当此谣言四起，局势动荡不安之际，多尔袞仍明确坚持设盛京留守并实行迁都北京的政治主张。随从的谋臣范文程也反复向亲贵大臣申明，当此明朝灭亡“黔首无依，思择令主”时刻，清军应当革除往年入关劫掠之风，急需更弦易辙，改变“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才能抓住机遇，“统一区夏”，夺取全国政权。在迁都愈来愈多取得共识的条件下，多尔袞不失时机地派遣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携带迁都奏旨驰返盛京，要求顺治帝、两宫皇太后与朝廷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机构抓紧搬迁准备，从速迁都。奏旨中尖锐指出：北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应当急速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与此同时，多尔袞还就留都盛京的驻守做了安排。由于措施得力，八月二十日，顺治帝与朝廷内阁机关、八旗官兵等两千多人从盛京城出发，于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据当时的目击者所见：“从盛京迁移北京的人流，日间络绎不绝，行李俱用骆驼运送，也有用马者。然其马并不施以鞍镫，其行李皆露于外。”这支具有相当高军事组织性的搬迁队伍到达北京后，顺治帝又于十月初一日“亲诣南郊圜丘，告祭天地，即皇帝位”。自多尔袞于五月初二日率军进入北京，至十月初一日宣告迁都大典完成，前后也就五个月。在17世纪40年代交通道路基础设



施条件限制下，此次都城搬迁规模之大，行动之迅速，显示了新兴清王朝锐不可当的蓬勃态势。

过去曾经有人认为，由于顺治帝迁都北京，盛京城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失控状态。经查阅当时文献记录，实际上当时清朝已经出台了一种适应战时需要对盛京实行总管制的治理方案。顺治皇帝在出发赴京前夕已发布诏书，任命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阿立哈大(满语，意为总管)。何洛会是多尔袞所辖镶白旗护军参领，是多尔袞信得过的高级军事参谋之一。此番经顺治帝正式任命为盛京总管，“统兵镇守盛京等处”，是清王朝迁都后仍要继续巩固“留都重镇”方略的体现。

在多尔袞决策立留都的谋划下，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清王朝在北京又正式颁发顺治皇帝诏书，规定以盛京为留都，并废止明朝的陪都南京，从而从法律上确立了盛京的陪都地位。据此，清王朝制定陪都官制，“定文武官员品级”。当时明令盛京官制可以比照京师品级，略

加调整与配备，并规定：“镇守盛京城总管官”为二品；“护福陵、昭陵总管官各二员，镇守盛京城两翼副管官、督促匠役总管二员，镇守宁古(塔)、雄耀(熊岳)、凤凰各城总管”均为三品；“护福陵、昭陵副

北京皇官武英殿





管官各四员，镇守盛京京城各旗章京、在外各城镇守官”等，均为四品；“护福陵、昭陵官、迎送使、管墩台两翼官、驻防锦州护军校”等，均为五品。从以上最早的盛京陪都官制可见，在盛京总管制度下，以盛京总管官为首，其下分设三城总管与各城守官，以统辖整个东北地区；同时又分设福陵、昭陵总管、匠役总管、管墩台官、迎送使官等，经办皇室以及留都维护等事务。从清初出台的这套最早的陪都建置方案看，无论是机构建置与官员配备都还很不完备。但从总的来看，它为陪都初立时期城市秩序的安定，乃至清前期盛京陪都统治体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创业重地固根本 陪都建置渐完备

尽管初期陪都官制尚不完备，但却恢复了入关前朝廷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前的“逢五常朝”制度。当年每月的初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黎明，官员要齐集在大政殿八旗朝堂（即俗称“八旗十王亭”）前的广场殿庭处。据曾经参加过“常朝”的朝鲜陪臣亲眼所见说：皇帝出坐后，八旗官员分左右排定班位“俯伏”示礼，“别无拜叩之礼”，“行茶一巡而罢”。清朝迁都北京，顺治皇帝已经不在盛京皇宫，故按京师“常朝不御殿之例”，称这种“陪都特制”为“坐班”。陪都大政殿前的“逢五”坐班制，初期对促进盛京总管府机构的运转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盛京地方局势的日趋安定，特别是原来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外地的“流民”纷纷返回原籍，盛京总管府机构不完备的弊端也日益暴露了出来。当时清朝群臣纷纷向朝廷上奏，建议重订“陪都规制”，认为只有充实与完善陪都的机构建置，才是“充实根本”、“以图久远”的良策。顺治十七年（1660年），甚至已经发现盛京皇宫永福宫有“廊柱倾斜”、“椽子糟烂”的险情。廷臣王益朋在《请定丰镐神区规划疏》的奏折



沈阳故宫大政殿与十王亭

中，更引经据典以前朝明成祖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陪都的史例，反复论证决不可置“旧都于偏废”，而应当加大力度强化维护和管辖，完善机构建置，才能“加意根本”，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在经过多次廷议取得共识后，清王朝逐步开展修缮陪都宫殿，并先后对盛京的机构建置、职官配备等进行改革，逐步形成了以盛京将军府为核心的陪都机构新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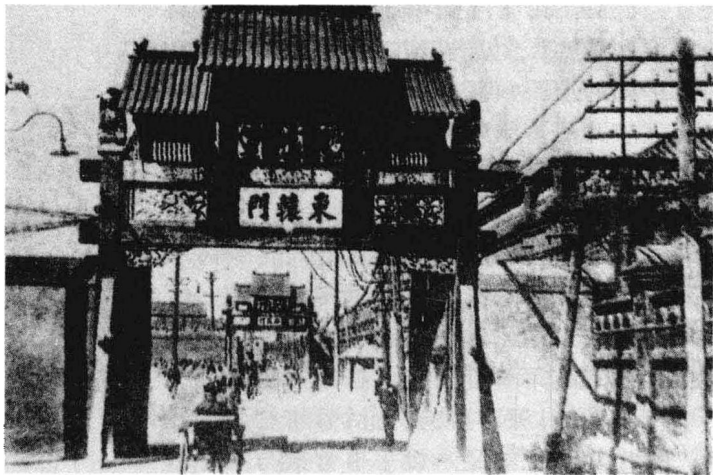
盛京将军府衙门是在原来以盛京阿立哈大为最高军政首长的“盛京总管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调整、更名与协调机制后发展起来的。在“盛京阿立哈大”执政时，清朝实际上实行八旗军事管辖制。在战争状态下，八旗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以及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经济职能被弱化，突出与强化的是八旗军事管辖与维持治



安的职能。因此，这种以“盛京阿立哈大”为陪都最高首长的总管制，实质上是以八旗将领统辖地方的战时军事管辖制度。

适应结束战争状态与招徕移民从事恢复经济的需要，清王朝多次颁布开垦旗地诏书，规定在京旗人“若将在京所受地亩退出，准拨给盛京熟地，不退者，以荒地拨给”，鼓励盛京旗人从事农业生产。与此同时，清朝还颁布著名的辽东招民开垦令，将出关前来盛京的汉民安置入籍，编成民地。在此过程中，为强化对旗民经济事务管辖，清王朝调整了陪都盛京的机构设置，逐步强化八旗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对旗民地亩的管理。顺治三年(1646年)，“盛京阿立哈大”改称“盛京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康熙四年(1665年)改称“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

盛京将军府东辕门





改称“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自此，这个“盛京将军”官名直至清末沿用未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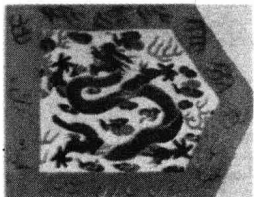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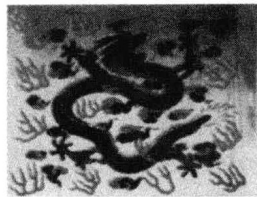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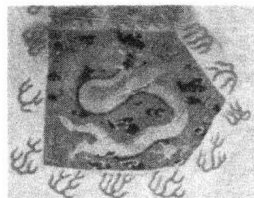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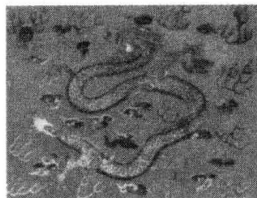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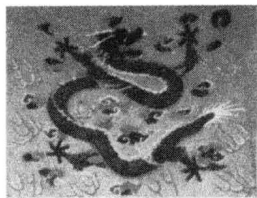
作为陪都最高军政首长“盛京将军”官名的更名变化，除了因辖区调整因素外，更主要的还与职能及运行机制的改革紧密相关。适应维护陪都治安管辖和城市恢复建设的需要，清王朝依据盛京满汉多民族杂居的民族特点，确立以盛京驻防八旗为中心的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当时规定：盛京城内分区管理，推行各旗管界治安负责制。盛京城“南之左为德盛门”（今沈阳大南门），“属镶黄旗防御、佐领等管界”；“南之右为天佑门”（今沈阳小南门），“属镶蓝旗防御、佐领等管界”；“北之东为福胜门”（今沈阳大北门），“属正蓝旗防御、佐领等管界”；“北之西为地载门”（今沈阳小北门），“属正白旗防御、佐领等管界”；“东之南为抚近门”（今沈阳大东门），“属镶红旗防御、佐领等管界”；“西之南为怀远门”（今沈阳大西门），“属镶白旗防御、佐领等管界”；“西之北为外攘门”（今沈阳小西门），“属正黄旗防御、佐领等管界”。按当时官阶等级，佐领为秩正四品，满语为“牛录额真”。天聪八年（1634年）改称牛录章京。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牛录章京汉语名称为佐领。防御的官阶级别比佐领低，是正五品官，隶于佐领之下，协助佐领处理旗政事务。

伴随着盛京八旗基层行政管辖的加强与治安的好转，社会经济开发与城市建设任务日益增多，承办经济、文化、法治、教育的职能机构也陆续恢复与增设。早在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清朝宣布增置盛京赞礼郎，至康熙初已陆续在陪都增设盛京礼部、盛京户部、盛京工部、盛京刑部、盛京兵部，通称“盛京五部”。由于盛京职官，



都由京师“吏部铨选”，故不设“盛京吏部”。在清代官制上，“盛京五部”为清朝在陪都特设的行政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在所承办的

八旗旗帜图



业务上与京师各部关系密切。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朝又决定增置盛京内务府，并指令由盛京将军兼任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以利于进行陪都城市建设和维护盛京皇宫、陵寝，管理祭礼等事务。与此同时，由于盛京地区经济开发，移民日增，“旗人与民人杂处”现象日益发展，没有加入“旗籍”的民人猛增的态势。于是清朝又决定，仿照京师建立起相应的治民机构。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朝宣布废辽阳府，改设“奉天府尹”，